

就是被边缘化。所以 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没有其他竞争性的政党甚至共产党党内不允许有派、权力来之于任命而不是来之于人民普选的情况下,谁能真正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党政分开等问题?谁会来实行权力重新分配呢?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任何一次希望突破现制度框架的改革企图都没有成功就是最有力的佐证。这个党已经越来越被权力绑架。党政分开首先意味着党要剥离出这种实实在在的权力,也就是要剥离那些由党任命的干部手中的权力,意味着权力的重新梳理,该政府的还政府,该社会的还社会,该人民的还人民。而尝到不受约束的权力的甜头的官僚集团——已经由干部任命制特权制而形成的分利集团,是不会为这种改革推波助澜的。当他们将公权力私用,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捞足了以后就急不可待要将之合法化,而私有化就是最佳出路。这些曾经的旧贵堂而皇之又成为新体制的新贵。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最后成为怎样的党、走向何方、最终结局怎样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倘若他们自己不暇自哀,我们必哀之,哀之又必鉴之以反观自身。否则,会使后人复哀我们也。

苏联的解体是从道德沦丧开始的

黄军甫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51)

一

苏联的解体,国内学者最初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及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两种观点今天来看显然都站不住脚。苏联和西方的对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苏联国家战略两重因素决定的。因此,双方彼此互为对手,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苏联最终垮了,把原因推给对方,这无异于商战中某公司出了问题归罪于竞争对手。同样,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同样不符合实际,它不经意间无限夸大了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作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一个党的全部本钱建基于某个领袖或公民的是否忠诚上,“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当然,西方人囿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考量,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苏联民众追求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结果,是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苏联解体不久民族主义的勃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普京式专制主义的暗流涌动,代议制和多党制的不断式微,表明:把苏联解体简单化为民众对民主和市场经济追求的结果是不恰当的。

二

必须承认,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苏联社会内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苏联模式的弊端是它解体的根本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苏联的解体进程是从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开始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开宗明义:城邦的目的是善。而善在政治学里就是公平正义,就是道德规范。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道德生活,就没有和平、和谐的政治生活。中国儒家强调的德政、以德治国等理念,更是明确地将道德视为政治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终极意义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的叛逆者拍案而起,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是基于道德诉求,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残暴、不人道的抗争,基于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对“从头到脚都滴着血

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义愤。马克思、恩格斯在篇幅不多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照例把道德置于重要位置,把平等、自由、和谐及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视为主要社会元素。

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从政府到官员、民众,不遵守道德规范,践踏正义,腐败堕落,那么,该社会不仅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很可能是政治革命的开端。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的根源虽然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其直接的动因并非“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根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考察,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当政时期,是君主制最繁荣时期,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诱因首先是从君主制政府的腐败开始的。革命前,政府不仅首先摧毁了社会公平、正义赖以存在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摧毁了政治阶级、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而且为了满足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最大工程的承包人”。与此同时,政府卖官鬻爵,寻租、受贿,包揽诉讼,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政府金钱至上和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是全社会欲望的膨胀。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新热情”,“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欲望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在一切阶级联系、一切共同的情感纽带都被摧毁的当时法国社会,这种萎靡堕落的现象不断弥散扩张,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然而,直接促成法国大革命的因素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而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沦丧的事实,认识到这种沦丧对自由、平等,对人的尊严的否定。这种认知的转变是由启蒙学者引领的。当大革命前法国的一切文化形式、哲学理念、宗教教义、道德规范甚至宫廷礼仪都要经过理性法庭审判时,旧制度的变革便为期不远了。列宁说,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按我的理解,“不能照旧”主要是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发生了根本改变。

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社会。这种社会使劳动和劳动者第一次克服异化,其手段是把生产资料、财富、公共权力交付给社会,把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还给社会成员。在推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仍旧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虽然存在,但业已丧失了包括镇压职能在内的许多职能。有国家当然有官吏,但官吏必须选举产生而且可随时撤换。更重要的是,官吏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老爷。他可以拿薪水,但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加之国家较之社会日益萎缩,社会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政府)是非常廉价的。

按照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苏式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在马克思看来不具备政治、经济前提的条件下建立的。这很容易使该制度的建构者进退失据,陷入困境:要么坚守教义而被推翻,要么适应环境修改教义。但这时革命已或多或少地背离了革命者的初始目标。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在特定时期实施红色恐怖;本来宣称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设廉价政府,但却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国家机器;本来宣称建立最平等的社会,却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本来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却事实上取消了政治自由的几乎一切形式;本来一切财富要交给社会支配,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追逐财富……

苏式社会主义这种道德上的缺陷如果不通过改革加以摒弃,必将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现象一样,成为革命的潜在动因。可悲的是,这种缺陷在苏联和东欧被日益放大。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国家层面上,

政府鼓励谎言、迷信暴力,谎言和由暴力产生的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哈维尔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恐惧和谎言,“以及随后更为精巧的利益贿赂,获得人们唯心地臣服,全社会逐渐习惯于用谎言换取安全和利益,于是出现了一幅荒诞且道德腐败的图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个人与社会道德极度堕落,社会没有了希望”。在干部层面,人们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信仰,做官不再是为人民和社会服务,而是享乐的手段和攫取财富的工具。曾任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毫不掩饰地对其母亲炫耀财富,私下对胞弟说“共产主义是骗老百姓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高级干部分14个等级,这些人及其家属占全社会的1%,但却享受着大部分的消费产品。这部分人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完全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特权阶级。苏联民众对这一特权阶级深恶痛绝。据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控制虽有所放松,但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已经把社会财富瓜分完毕。他们各霸一方,又彼此照应,在把持社会财富所有源泉的同时,堵塞了自由和道义的所有源泉。苏联道德沦丧的最可怕方面是民间道德体系的崩溃。谎言、奴性、告密、行贿受贿、毫无廉耻地追逐财富和社会地位等现象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在这种道德氛围下,民众自然成了畸形社会的帮凶,成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的主体。

四

行文到此,人们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社会急剧变革的因素想必有足够的共识。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偏偏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当然,这种违背常识的现象却被政治制度史中的无数个案证明是规律性的东西。托克维尔和波普都明确指出:一个坏的制度往往在它开始改革时引发革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苏联覆灭的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民众普遍认识到社会道德的沦丧,认识到“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认识到必须与过去的道德立场划清界线,要过一种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这种认知上的急剧变化使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受到挑战,并最终成了足以摧毁整个旧制度大厦的革命的直接动因。不可否认,苏联社会否定现实制度和道德的认知变化,形成的汹涌澎湃的公众舆论,进而形成的实际的变革运动,都是由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新思维”开启的。但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人们迟早还会觉醒,迟早还会寻求有尊严、有意义、有德性的自由生活。但结果未必比现在好!

苏联文化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危害

孙 健

(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上海 200241)

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完成了一次巨变,即由列宁倡导建立的比较活泼、自由和相对民主、开放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向斯大林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转变,也是由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体制模式向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变。这场转变深刻影响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也是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体制转变的原因是苏联党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1928—1929年俄共内部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展开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斯大林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首先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战胜了布哈林,为了在思想理论上也战胜在苏联理论界具有很高地位的布哈林,清除布哈林的思想影响,控制思想理论界,斯大林发动了意识形态“大转变”运动。斯大林利用当时已树立的党的领袖的权威和地位,